

生似和刀，謝如落櫻 —孫文先生的東洋友人錄

宮崎滔天、梅屋莊吉、山田良政，此三人為孫中山及其革命事業而奮鬥、捐款，以至為其而死，亦可見得孫中山先生之人格魅力與中國革命大業之恢弘偉大。其僅為孫中山300多位日本友人之代表，秉武士之精神，而鑄革命之大業，生之磊落，死之壯烈，為漢才和魂與國際主義精神之體現，當讚以「生似和刀，謝如落櫻」八字。

文：裴正載 資料圖片

回溯這一段歷史，是為了銘記在孫中山先生事業中，作出了貢獻的國際友人，也是為了一衣帶水的相鄰之邦世代友好，唯有如此，才能不辜負曾經的歷史參與者，讓他們安懷於星空的歲月中。

宮崎滔天：革命軍中的武士

儘管出身於武士家庭，宮崎滔天並沒有止於武道，在早稻田大學接觸了自由民權運動的思想後，他決心投身於亞細亞維新運動。「無支那則無亞細亞」的想法讓他更願意在中國廣尋人才。1891年，他是受命於日本外務省調查中國秘密結社的情況，這時他的想法我們不得而知，但身份僅一浪人探子。六年間，他沒有「找到治世豪傑，願效犬馬之勞」，也沒有「挺身自任」。直到1897年，在陳少白的寓所內，兩人相談甚歡，臨行前，陳少白遞給他一份英文小冊子—《Kidnapped in London》並說「這就是那個人。」這本《倫敦夢難記》講述的正是孫文先生英國遇險的故事。

宮崎滔天兩個月後在香港聽說了孫中山到達橫濱的消息，遂即啟程回橫濱的陳少白寓所。到了寓所，女僕稟報孫文仍在就寢，宮崎滔天於是站立在庭院中等候。孫中山穿着睡衣，尚未洗漱，武士看着他。然而談起中國革命，孫中山頭頭是道，一針見血，「一言重於一言，一語熱於一語，」感動了精神上身披鎧甲，高明而高傲的武士：「余於茲與孫逸仙初結刎頸之交。」

宮崎滔天一生為孫中山，為中國革命所做良多，包括撮合、調解孫中山黃興二人，其令人最莫忘的就是一時沸沸揚揚的「刺康事件」。1900年，宮崎滔天在孫中山勸說梁啟超失敗後，仍對革命派和改良派的合作抱希望，他不顧孫中山的勸說，執意趕往新加坡欲說動康有為。但康有為一口咬定宮崎滔天是刺客。康有為先是婉拒了宮崎滔天的見面要求，再三推辭之後甚至表示「贈百金，以作程儀。」宮崎滔天深感受辱，他此行新加坡，原是想向當時在海外更有影響力的改良派尋求合作，卻不想見到的是如此一個怕三怕四，畏畏縮縮的小人。與幾年前自己拚死從廣州萬木草堂保出的那個改革家判若兩者。悔憤之下，他寫了一封語氣激烈的絕交信給康有為，這使康有為對他更加懷疑，最終通知了當地警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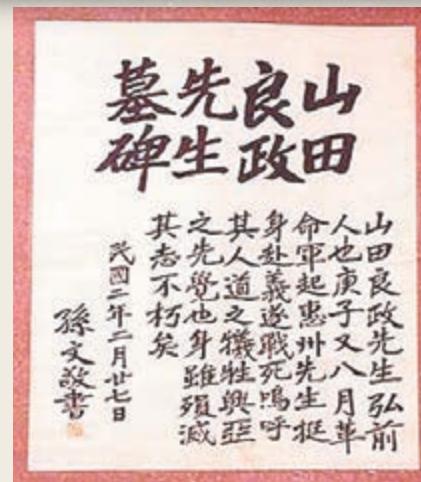
7月6日，當地員警荷槍實彈地闖進宮崎滔天所在的松尾賓館，其時宮崎滔天正在彈奏琵琶，按他那時心境，想必也是亂音極多。從他的行李裡搜出了三萬元現金和兩把武士刀，並逮捕了他。以刺客的罪名遭捕



■孫中山與日本友人合影



■日本介紹中國革命的宣傳品



■山田良政碑文



■孫文遺像

■梅屋莊吉製作贈送的孫文銅像

梅屋宅邸中。孫中山與宋慶齡的婚禮更是在梅屋莊吉家中舉行。

山田良政：獻身惠州 精神永存

多少人能為一年之交赴死？山田良政便是其中之一。直到1899年7月，山田良政才在東京見到了孫中山。因為其隱晦的前半生經歷，關於他個人的思想感情記述較少，我們所知道的僅是，他深深地為孫中山及其革命之道所折服，以致一年之後就可以為中國革命犧牲。但也可看出蛛絲馬跡——戊戌變法失敗之後他就曾護送維新派人士王熙出逃。

惠州起義時，孫中山與山田良政皆在台灣，但因存於台灣的起義用武器無法正常取出，孫中山派山田良政傳電起義軍司令鄭士良：「政情忽變，外援難期，即到廈門，亦無所得，軍中之事，請司令自決進止。」

山田良政立刻啟程前往內地惠州，其時起義風聲已經走漏，清政府已經有所防備，東亞同文會特地通知山田良政避開，但他不顧勸阻仍決然前往。

沒有人知道山田良政如何在檳榔雨中到達三多祝又如何找到起義軍領袖鄭士良，而他作為一個惡訊的傳報者又抱着怎樣沉重的心情和使命感。他曾是一個間諜，他與資訊打了一生的交道，而唯獨這一份資訊是他所要傳遞的第一段有着偉大意義的情報，也是他傳遞的最後一段，他是現代的菲迪皮茲，與那位古希臘的勇士一樣，他同樣在資訊傳達後犧牲——返回途中，他因迷路被清軍逮捕殺害。這時候他已經不是烏鵲般的斥候，而是白鶴一樣的信使。將他的死比作落下的櫻花般絢爛實在有些豔俗，但從一個黑暗中的探子到光明下的武者烈士，其英雄式的蛻變也不只這豔俗的比方所能形容的。

武魂如故嘆今昔

熊本縣荒尾市的宮崎家舊宅裡，簡約裝飾的前堂上有一塊橫匾，橫匾上是遒勁抱圓的四個黑色漢字：推心置腹。這正是孫文先生贈予日本友人宮崎滔天的，也是他與這位武士英雄情誼的象徵。鮮為人知的，是宮崎宅裡還保存着一副大將軍黃興的贈字：儒俠者流，用這四字概括宮崎滔天的一生也最不為過。

二天一流刀法的創立者是宮本武藏，以右手握太刀，左手握小太刀為勢，統一左右兩手上大小太刀的動作以擊敗敵人，取陰陽調和之道。宮本武藏說這不只是劍術，甚至蘊含着世界之理。宮崎滔天小時在荒尾村的鄉野間與父親兄長練習這刀法時不會想到，未來他將跟隨一個異國人，為此刻揣摩於指上刀尖的「世界之理能遍及混蒙的大地而奮鬥」。

1922年，宮崎滔天因腎病與尿毒症併發逝世於東京，骨灰葬於熊本縣的顯聖寺，其人一生，好像浪人手中的刀一樣乾淨利落，不帶絲毫的拖沓，斬淨不公與不平，宣耀他的真理，亦真如刺鷹客顯聖。

■宮崎滔天



不可忘卻的「賢母」

日本最早的電影公司「日活公司」的創始人梅屋莊吉生前保存着一件綢質短褂外衫，背面題有「賢母」二字書墨，署名正是中國革命之父孫文先生。「賢母」二字正是梅屋莊吉在孫中山領導的革命中扮演的角色，他就是革命源源不斷生命力的來源。1890年代的香港，攝影館並不鮮見，而中環附近的「梅屋寫真館」格外的熱鬧，除了前來攝影的顧客，更有興中會的革命志士出入。這其中一位短髮乾淨利落，身着西裝的紳士就是孫文先生。

孫中山組織的十場武裝起義中，每一場都有梅屋莊吉的捐贈。武昌起義打響之後，梅屋莊吉深以為這將是改變歷史的事件，毅然一次性捐款17萬日圓，並派遣攝影師前往前線拍攝影像。捐款使他負債累累，然而他並沒有依靠播出武昌前線的珍貴戰爭影像獲利，而是將這段影像第一時間予孫中山播放，可見其對中國革命熱忱之深。

「賢母」二字，當之無愧。梅屋莊吉沒有豪言壯語，甚至規定死後不允許後人公開他幫助中國革命的往事，只是默默傾心傾力，履行了自己25歲那年「君舉兵，我舉財」的承諾，這樣的清低幽雅，彰顯了英雄的風範。



■梅屋莊吉

共和革命 來自他鄉之第一人

深圳三洲田有一尊名為「海外急電」的雕塑。雕塑中的年輕人騎在馬上，身體向前傾，一身精幹打扮，短髮向後飄揚，典型的東洋人五官，鏡片後細長的眼眸中滿是堅毅，馬身躬曲作急奔狀。

這刻畫的是「外國義士為中國民主革命

犧牲之第一人——山田良政。」惠州起義失敗的13年後，即1913年，孫中山訪問日本時，為其撰碑文志：「其人道之犧牲，興亞之先覺也，身雖殞滅，而志不朽矣。」與共和民主宏圖上沾染的所有鮮血一起，山田良政應為我們所銘記。

■山田良政

